

# 馬基維利的國際現實主義：兼論弱國的外交抉擇

閻亢宗\*  
賴元斌\*\*

## 摘 要

馬基維利被視為是當代政治現實主義的奠基者之一，他的思想也對當代國際政治產生深遠影響，他將國家擬人化，認定國家如同個人具有趨利避害、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國家理性，身處這樣的世界，權力和安全是統治者最高考量。這種傾向會刺激各國強化武裝，當所有國家都大幅挹注軍事投資，將形成軍備競賽的「安全困境」。馬基維利探討過去歷史和義大利當時所處國際環境，發現各國為維護自身安全和擴大利益，會採取權力平衡的策略，但他強調「創建者」的角色，勢必打破權力平衡的有效性，將國際秩序推向霸權穩定論，國際社會將始終存在崛起霸權向現狀霸權挑戰的現象，當前者權力超越後者，就會產生權力移轉。對於弱國而言，馬基維利指出，採取中立政策將自取滅亡，這使得弱國必須在權力平衡和搭順風車策略之間做出選擇，由於弱國搭順風車等於是將自身生存交在強權手中，故多偏向採取權力平衡的策略。

**關鍵字：**安全困境、現實主義、搭順風車、權力平衡、權力移轉

---

\*中原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教授(通訊作者)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學生

電子郵件: eugene@cycu.edu.tw

收稿日期：2022.11.03

修改日期：2023.03.20

接受日期：2023.03.27

# Machiavelli's International Realism: The Diplomatic Choices of Weak States

Hang-Tsung Yen\*  
Yuan-Bin Lai\*\*

## Abstract

Machiavelli is seen a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modern political realism. His thoughts have had a profound effect o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e personalizes the nations by stating that a nation, like an individual, pursues advantages and avoids detriments. He also glorifies instrumentality in state building—an approach embodied by saying that "the ends justify the means". Power and national safety are the top priorities for rulers of the world. With this mentality, rulers have a tendency to strengthen the military force, which justifies further investment in the military. Arms races can lead to a security dilemma. Machiavelli's analyses of the history of Italy revealed that states adopted the strategy of balance of power when they attempted to protect their personal safety and expanded their benefits. His stress of the role of "founder" is bound to ruin the validity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it leads to the theory of hegemony stability. The phenomenon of the rising power challenging the status quo power will exist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hen the former surpasses the latter, it will lead to a power transition. As pointed out by Machiavelli, weak states who adopted a neutral policy ended up defeating themselves. Thus, this triggers the weak states to make a choice between 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bandwagon'. Since bandwagoning is tantamount to submitting their own survival into the hands of the powerful states, weak states are likely to use the strategy of balance of power.

**Key words:** Balance of power, Bandwagoning, Power transition, Realism, Security dilemma

---

\* Professor,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correspondence author)

\*\* Taipei Wego Private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 壹、前言

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時代的義大利處在分崩離析的狀態，沒有一種力量足以統一整個半島，各國之間你爭我奪相互戰爭，這種混亂狀態給了法國、西班牙和日爾曼等外來勢力上下其手的空間。1494年，爆發歷時半個世紀的戰爭，西班牙、法國，甚至北方的日爾曼人不斷出兵干預義大利，那不勒斯(Neapolis)成為西班牙的勢力範圍，法國亦曾二度佔領米蘭。馬基維利訴說當時義大利的悲慘遭遇，認為義大利人比希伯來人更受奴役，比波斯人更受壓迫，比雅典人更顛沛流離，既沒有首領，也談不上秩序，屢受打擊，任人劫掠，分崩離析，慘遭蹂躪，備嘗國破家亡之苦(P. ch.26)。

在這個特殊時代，馬基維利憑藉敏銳嗅覺和第一手的政治實務經驗，建立獨有的國際政治理論。馬基維利擔任佛羅倫斯(Florence)的國務秘書長達 14 年，在這段時間，他負責佛羅倫斯國防和外交事務，並前往包括法國、日爾曼，以及義大利大小邦國進行外交工作共 33 次，從實際外交經驗中，觸發他許多感想，此一時期的歐洲也正是民族國家成形的時刻，他見識到神聖羅馬帝國、西班牙與法國等大國在國際外交上所發揮的驚人威力，也體會到小邦林立、政治立場分歧的義大利所處的危機，這些政治場域實際發生的景象促使他思考，什麼是國家的理想和有效運作模式？如何應對外來強權勢力的挑戰（閻亢宗，2007）？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馬基維利從歷史和當代成功統治者的統治之道中尋找答案，他讚賞古羅馬時代的德行及光榮，認為在他那個時代，前人所留下的典範已經蕩然無存，但他並未因此灰心，因為他確認人可以改變自己生於其中的制度環境，這由他所讚賞的幾位統治者，包括馬其頓國王 Alexander、西班牙國王 Ferdinand、羅馬教皇 Julius II，特別是推崇 Cesare Borgia 及其父 Roderigo Borgia 的統治技巧即可看出。

這幾位馬基維利眼中的偉大統治者，具有馬基維利欣賞的同樣性格，他們的統治都流露出「凶猛如獅，狡詐如狐」精神，這種特質賦與了馬基維利國際政治思想的獨特性，也是他與中世紀政治思想的最大絕裂。這種絕裂表現在國家的最高優位性及非道德性，國家是最高目的，為維護國家利益和安全，可以不擇任何手段。這種被形容為馬基維利主義(Machiavellism)的思維，緣自馬基維利不關心政治義務，反而著重現實問題，他感興趣的是國家如何才能長治久安？統治者如何奪取及確保權力？他在尋求答案時，訴諸的是經驗和歷史，這種從權力出發倡議的另類道德觀影響性仍然非常強大，他之所以被認為是西方現實主義的開山始祖，亦在於從實然而非應然，從現實而非理想看問題，因此得出不為主流道德思想見容的觀點（閻亢宗，2007）。

馬基維利主義雖然受到許多批評，但不容否認，受馬基維利思想影響的政治現實主義，仍是主導當代國際政治的主流，它影響無數國家決策者的國防與外交政策思維，特別是強權國家的相互攻防與合縱連橫。<sup>1</sup> 即使已步入 21 世紀，但馬基維利的幽魂仍然縈繞在國際場

<sup>1</sup> 馬基維利主義在政治現實主義方面居於承先啟後的角色，在馬基維利之先，古希臘歷史學家和軍事將領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探究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時，發現此一戰爭無可避免，因為斯巴達對雅典實力的增長心生恐懼，此一對於國家實(武)力在戰爭發生扮演關鍵決定性因素的結論，後來被美國政治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illet Allison, Jr.)稱之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

馬基維利引導的現實主義思維，其後衍生出不同的分枝，包括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等。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認為國際體系中的無政府狀態是國家侵略行為的主因，大國追求權力最大化，通過卸責和平衡策略，最終達到主宰國際體系的目的；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認為，國家首先關心的不是權力最大化，而是維持其在制度

域，國家利益仍是各國思考對外政策的最高原則，權力仍是界定地緣政治的最主要概念。這是一種時代的反諷，馬基維利在世時看不到他的理念實現，卻在他過世後，國際政治走向了後馬基維利時代，這也是探討當代國際政治不能不重新審視馬基維思想的理由。

除此之外，本文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從小國和弱國的角度，審視馬基維利主義視角下的國際政治，以及小國、弱國如何在此一國際格局下的生存之道。就現實主義的觀點，小國無法在大國主導的國際格局中享有獨立自主空間，因此可行的生存之道有二，一是採取中立政策，在大國之間不存立場、左右逢源；二是一面倒向特定大國，尋求大國的庇護。究應做出何種選擇，迄今為止仍是爭議，特別是在 2022 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芬蘭與瑞典放棄中立申請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後，更引發議論。針對此一爭議，馬基維利顯然採取倒向大國的選擇，並結合歷史與當時環境，提出了獨到見解，這些見解也提供日後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非常豐富的論述素材。

本文將從 4 個面向探討馬基維利思想對國際政治的影響，首先從馬基維利的行動主體國家出發，描述馬基維利設想的國家性格以及生存策略；其次探討國家行為者在以安全為首要考量，以及擴張主義傾向，可能形成的「安全困境」；第 3 個面向，將探討馬基維利觀察到的權力平衡關係，並評估此一現象對國際政治的影響，同時評估馬基維利對於「創建者」(founder)的重視，可能衍生的權力移轉問題；第 4 個面向，本文將把焦點置於國際脈絡中的弱國角色，探討強權政治弱國如何自處；最後綜上所述作出總結。<sup>2</sup>

## 貳、非道德的國家性格

嚴格說來，馬基維利未曾清楚界定過「國家」概念，他的國家觀念係與「君王」(Prince)連結，也就是將「君王」作為國家的上位概念，就此而言，馬基維利的國家觀，就是「君王的國家」觀，他所描述的君王性格，實際上就是國家的性格，君王的理性就是國家的理性(reason of state)。<sup>3</sup>明乎此，要明白馬基維利如何看待國家，就必須了解他對君王應如何統治國家的看法。

現實主義鼻祖之一的漢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曾表示：「馬基維利主義短期之內不會消失，事實上，它根本不會從世界消失，若會，那就是世界擺脫邪惡的救贖(Morgenthau, 1974)。」摩根索之所以有這樣的理解，緣於馬基維利幾百年來的教導，最重要意旨就是要求統治者應擺脫傳統道德的限制。馬基維利強調詐欺在政治行動的重要性，統治

---

中的地位，這使其與攻勢現實主義產生分歧。基於「均勢比炫耀更為普遍」的假設，守勢現實主義者斷言，在國際體系中謀求霸權的國家將被尋求維持現狀的其他國家制衡；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發展於冷戰結束後的 1990 年代，它融合了古典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特別是守勢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中的國家行為可以通過系統變數(systemic variables)、認知變數(cognitive variables)及影響外交政策決策者權力和行動自由的國內變數(domestic variables)做出解釋。

<sup>2</sup> 本文主要以馬基維利的《君王論》(*The Prince*)作為申論引據，內容中引述馬基維利的話及思想，註釋中以 P 代表，並以章次呈現。

<sup>3</sup> 國家理性(reason of state)是十六世紀中葉出現的概念，首次出現在 Giovanni della Casa(1503- 1556)的著作，與馬基維利的名字連接在一起是透過 Giovanni Botero(1540-1617)所著《論國家理性》(*Della ragion di Stato*)一書，這本書一開始就說「我很驚訝竟然每天都聽到人們談『國家理性』，並引經據典援引馬基維利與 Tacitus，……我實在搞不懂，為什麼一個這麼不信任神的作者，……會被捧得這麼高。」參閱張旺山，(1997)，「馬基維利革命：『國家理性』觀念初探之一」，陳秀容、江宜樞主編，*政治社群*，頁 77-79，台北：中央研究院。

者應學習如何隱藏真心、扭曲事實和美化真相，並在必要時以殘酷手段徹底摧毀敵人。

馬基維利對於統治者非道德的強調，緣自他對人性的看法。他認為人性是忘恩負義，容易變心，是偽裝者、冒牌貨，是趨利避害者。人永遠不會為善，除非情勢逼得他如此(P. ch.17)。馬基維利對人性的看法成為日後建立國家理論的根據，最典型的論述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巨靈》(*Leviathan*)一書。霍布斯認為人性自私自利，這種自然狀態導致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戰爭，原始社會充滿了恐懼和暴力，人類的生活既殘忍且孤獨。(Hobbes, 1974)。

馬基維利和霍布斯雖然從不同角度詮釋了人性自私，但卻得出相同的結論，要維持國家的安全必須有一位極權的統治者，而身處這樣的世界，權力和安全是統治者最高考量。對於馬基維利而言，國家(君王)安全具有最高的優位性，國家安全的威脅來自統治者未能適當處理內部和外部的危機，而安全的最重要憑藉就是權力。馬基維利最著名的《君王論》(*The Prince*)一書，即是如何取得、維持和擴展權力的實用手冊。德語的 *Realpolitik* 可以貼切的形容這種「國家理性」。*Realpolitik* 主張，統治者應以國家利益做為內政和外交的最高指導原則，不應該受到感情、道德、理想、甚至是意識形態的左右。<sup>4</sup> 所有的一切都應為國家利益服務。十九世紀末發起統一戰爭的普魯士即是受此感召，主張戰爭為維護國家利益的手段，國家利益即是戰爭的充分理據，無需再找其他道德理由。

馬基維利對國家安全的重視，使他關於國家性格的論述引起極大爭議。為了確保國家安全，統治者可以採取任何必要手段，包括非道德的行動，而這些行動在一般情形下禁止個人所為。國家的目的性因此證成了手段，這正是「國家理性」的核心要旨。許多人譴責馬基維利的非道德國家形象，但也有人為馬基維利辯護，認為統治者必須遵循一套不同於一般平民的道德律例。由此也顯示出馬基維利主義子然不同的道德雙重性，一端是在任何情形下皆不應改變的傳統道德，例如宗教傳佈的個人救贖；另外一端則是統治者的道德，必須為維護國家安全的最高目的採取各種必要的行動。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將前者稱為「心志倫理」(ethic of absolute (ultimate) ends)，將後者稱之為「責任倫理」(ethic of responsibility)(Weber, 1978)。<sup>5</sup>

兩種看似矛盾衝突的道德觀，在「國家安全」上獲得了統一。若是有益於國家安全，統治者可以行善，但若出自維護國家安全的必要性(necessity)，統治者就應該做惡。馬基維利此一觀點緣自他對政治場域的實然與應然嚴格區分：

人們實際上怎樣生活與人們應當怎樣生活，兩者有極大距離。一個人要是為了應該怎樣辦而把實際上是怎麼一回事置諸腦後，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會導致自我毀滅；因為一個人如果在一切事情上都想以善良自持，當他側身於許多不善良

<sup>4</sup> *Realpolitik* 強調以利益為取向的非道德性格，極為類似「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描述的人類理性，理性選擇中的理性屬於一種工具理性，假設所有人都是理性主體，對於不同選擇間都存在偏好，個人會根據偏好來形成決策，做出行動。理性主體在形成偏好，做出決策之前，都會尋求所有可能的資訊，以理性進行綜合推理判斷，比較各種選擇方案的成本及效益，最後才會做出決策。此一決策不考量任何道德價值，純粹以成本效益為標準做出決定。

<sup>5</sup> 「心志倫理」如同宗教信仰，行動時只問目的是否正當，不考慮後果，因此，統治者必須毫不妥協地實踐某種純粹的原理原則；「責任倫理」要求行動必須考量可能的後果，統治者因此必須設想手段如何搭配目的的問題。

的人當中，定會遭到毀滅(P. ch.15)。

馬基維利關於國家安全、權力與道德的認知，流露出濃厚的現實主義色彩，也對後世產生巨大影響。摩根索幾乎用馬基維利相同的口吻表示：「雖然個人有為了捍衛(普遍道德)原則而不惜自我犧牲的道德權利，但國家要採取成功的政治行動，就不能將侵犯自由的道德非難成為它的障礙，因為國家主要是受到國家生存的道德原則所驅動(Morgenthau, 1974)。」同於馬基維利，摩根索認為雖然國家必定會按普世道德原則進行判斷，但它的行動必須遵循國家安全的原則，而後者的優先性超過前者。

不僅如此，摩根索甚至認為國家會將它的特殊意圖隱身在普世道德原則之後，易言之，當國家覺得有利於它的生存與安全時，就會利用普世道德原則，反之則會背棄此一原則。他所舉的最具體例子是大規模滅絕(mass extermination)，他說，國家在一般情形下，不會將大規模滅絕作為實現目的的工具和外交政策，此一自我設限來自絕對性的道德原則規範，但此一原則只適用在特定的狀況，不能排除國家在面對更高目的例如國家利益時，證成此一行為的可能(Morgenthau, 1974)。

摩根索採取的正是馬基維利主義的策略，在他眼裡，所有的政治行動者骨子裡都有馬基維利的血液，這也是他們的政治行動得以被證成的原因。摩根索和馬基維利的現實主義都在解決一個問題，政治行動者如何在採取非道德行動時，又能克服違背傳統道德的心裡障礙，也就是自認在做對的事情。兩人都認為政治行動者採取行動時，能夠同時達到道德和政治目的，關鍵在於符合國家利益與權力目的的政治行動即符合道德，當統治者自認所作所為符合國家利益時，他就會問心無愧的採取非道德行動。

這種融合道德與非道德的矛盾統一，讓現實主義的「國家理性」在當代國際社會大行其道。例如美國前總統喬治·赫伯特·華克·布希(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在發布的機密性(26號國家安全指令)(*National Security Directive 26*)中明白指出，控制中東石油、特別是伊拉克的石油，是維護美國安全的重要一步，並強調確保美國企業開鑿伊拉克石油權利的重要性(Friedman, 1993)。1991年布希發動代號「沙漠風暴」(Desert Storm)的戰爭，表面上理由是將科威特從伊拉克的佔領中解放出來，但《26號國家安全指令》顯示，美國是為了自身的國家利益。

最能表現美國現實主義色彩者，是喬治·沃克·布希(George Walker Bush)於2003年發動的全球反恐戰爭。雖然美國在全世界到處彰顯人權和自由價值，但許多作法卻公然違背這些價值。其中最受到譴責的事件，是在古巴關塔那摩灣(Guantanamo Bay)非法關押俘虜，並施以酷刑。此舉受到國際紅十字會和人權團體的抨擊，但美國卻以維護國家安全的理由為這些行為辯護，同樣的理由也用來辯護預防性拘禁和逮捕外國公民。<sup>6</sup> 這些行徑流露出鮮明的馬基維利主義雙重道德色彩，這樣的性格充斥美國對外政策，2011年1月出登的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以〈令美國難堪的盟友〉(*America's Other Most Embarrassing Allies*)為題，列舉8個美國的獨裁盟友，美國標舉民主，卻與這些獨裁國家維持密切關係，

<sup>6</sup> 2006年，「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組織公布的世界人權報告指出，虐待性的拷問行為是美國用來打擊恐怖主義的策略。2004年，美國最高法院否決了美國政府的辯護，多數法官裁定關塔那摩基地的囚犯有權向美國法院申訴，引證是美國對關塔那摩灣有唯一的控制權。

目的依然是美國的國家利益(Keating, 2011)。<sup>7</sup>

### 參、擴張主義和安全困境

馬基維利和現代政治現實主義都注重國家安全，因此非常強調軍事建設的重要性。馬基維利認為要使一個國家維持穩固有兩大要件，一是法律，一是武裝，但若沒有一支良好的武裝部隊，就不會有好的法律，因此，武力的重要性在法律之上。他在《君王論》第 12 章中舉了許多實例，過去的羅馬和斯巴達以及他那個時代的瑞士，都是因為整軍經武，所以才享有完全的自由，至於義大利，無論是教皇或者共和國，都因為不諳軍事，導致外敵入侵。馬基維利因此結論：「經驗已經證明，只有君主自己和武裝起來的共和國，才能夠取得巨大進展(P. ch.12)。」

馬基維利對軍事的重視，使其理想的國家成為道道地地的軍國主義國家，他說：

君主除了戰爭、軍事制度和訓練之外，不應該有其他的目標，其他的思想，也不應該把其他的事情作為自己的專業，因為這是統治者應有的唯一專業。它的效力不僅能夠使那些生下來就當君主的人保持地位，而且有許多事例，讓人們從平民百姓的地位一躍成為君主。反之，大家都知道，君主若沉醉於安逸，而忽視了對軍事的重視，便會亡國。亡國的第一個原因就是輕忽這種專業；而使你贏得一個國家的原因，就是因為你精通這門專業(P. ch.14)。

馬基維利對於武力的重視，不僅侷限於對內維持統治者權位穩固，對外避免外敵的入侵，也緣自國家的擴張傾向。他可能是少數認定帝國主義侵略傾向是人性本質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他認為獲取領土的欲望是人之常情，人們在能力範圍之內如此做時，總會受到讚揚而非責難(P. ch.3)。馬基維利此論來自他對歷史的觀察，歷史的經驗顯示「指望一個已經武裝起來的人心甘情願服從沒有武裝起來的人，或者沒有武裝的人側身於已經武裝起來的臣僕之中能夠安安穩穩，這是不符合情理的(P. ch.14)。」然而，此一見解無異為帝國主義和擴張主義背書，也使得任何國家無論為了自保或者擴張，都必須將大量資源投注於軍事建設。

這正是現實主義的觀點，現實主義認為國家是國際政治最重要的行為者，它最重視的是安全，而安全主要是以軍事力量界定。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建立在鬥爭和對它國的宰制上，所有國家為了生存與謀求利益，一定會擴張領域，並且會大量投資軍事建設，這個結果將會形成零和結局(zero sum)(Ofuho, 2004)。當各國競相擴大生存空間，就會進一步導致所謂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安全困境」緣自一國為了增加本身安全而採取增加軍備等特定行動，另一國家會將此視為本身的安全威脅，也採取相應行動，如此反而導致不穩定(Jervis, 1978)。

現實主義重視軍事力量，並會尋求擴張以確保安全的結論，對分析國際政治提供了有用的工具。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大師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其名著《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一書中，解釋了納粹德國何以選擇在 1939 年發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原因。米爾斯海默說：「直到德國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之

<sup>7</sup> 8 個國家分別是沙烏地阿拉伯、葉門、約旦、衣索匹亞、烏干達、亞塞拜然、哈薩克和越南。

前，希特勒還沒有威脅使用武力來遂行其野心的實力，這樣在 1938 年前納粹的外交政策相對較溫和。……到了 1939 年，希特勒最終擁有了傲視群雄的軍事力量，旋即展開公然入侵。」(約翰·米爾斯海默，2021)

米爾斯海默對納粹德國發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分析，對目前逐漸成為全球權力重心的亞太區域很重要，隨著亞洲經濟快速成長，已使此一區域成為 21 世紀的全球戰略中心，其中尤以中國的快速崛起最受矚目。中國經濟與軍事力量崛起，已打破過去美國主導的亞太秩序，但這個浮現的新秩序卻使此一區域陷入不穩定，因為沒有人知道中國恢復歷史強權地位對地緣安全的衝擊，這種不確定性與國際盛傳的「中國威脅」論緊密相連，雖然中國不斷宣示「和平崛起(發展)」，也不斷重申絕不稱霸，但只要各國相信馬基維利所言國家本質上帶有擴張主義傾向，中國現實上也確實在高速發展軍力，「中國威脅」論就有它的市場。

這種不安全感，讓亞洲國家持續挹注軍事建設，也讓此一區域出現現實主義所謂的「安全困境」。根據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ISS)研究報告，經通貨膨脹率調整後，亞洲國家 2021 年國防預算較 2020 年成長了 2.8%，其中中國的預算占其中的 43%，達到 2070 億美元，如圖 1 所示遠遠超過其他亞洲主要國家。報告指出，鑑於中國生產成本較低，因此其國防預算以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計算，應高達 3320 億美元。(Nikkei Asia, 2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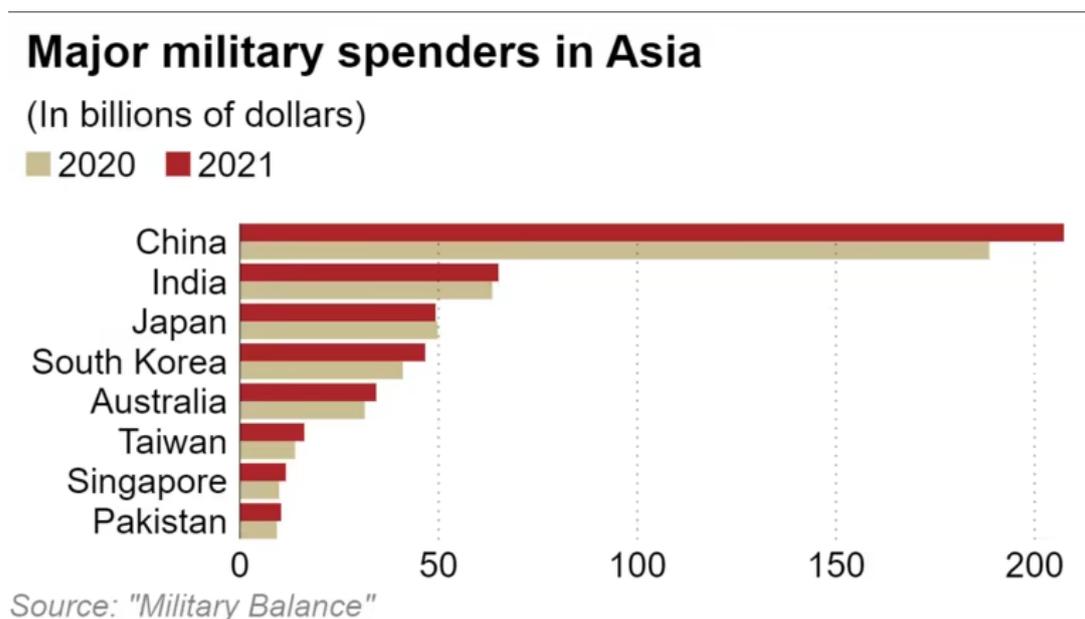


圖 1 亞洲主要國家國防預算

資料來源：22. Nikkei Asia. (2022). "Asia's military spending up 2.8% in 2021, bucking 1.8% global drop," 22. *Nikkei Asia*, February 15.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Asia-s-military-spending-up-2.8-in-2021-bucking-1.8-global-drop>.

由於中國近年強化對海洋主權與資源的聲索，並出現與周邊鄰國的衝突，這些國家由於擔憂中國軍事威脅，紛紛強化軍備，導致亞洲出現軍備競賽，形成這個區域的「安全困

境」。現實主義者認為，「安全困境」緣自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缺乏世界政府的結果，將導致各國產生恐懼感及相互間的不信任，為確保安全，國家會選擇極大化權力和強化軍力，故要解決「安全困境」問題，就必須從國際合作和增加互信著手。

現實主義對於國家之間是否能夠合作互信，出現兩種不同的觀點，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對於國家安全採取權力導向的策略(power-oriented strategies)，認為國家為達安全目的通常不擇手段，即使國家已取得絕對利得，也會因為不確定對手意圖，以及對於敵友的不確定性，最後選擇不合作，因此國家間合作的可能性極微，各國之間也很難建立互信。(Krokowska, 2010)。相較之下，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採取的是安全導向的策略(security-oriented strategies)，它關心的是國家安全和相對權力，如果國家安全獲得保障，且本身獲取較多利得，即可能採取合作立場，進而增加彼此互信。簡言之，古典現實主義採取的是一種權力極大化(power maximization)策略，追求的是絕對權力；新現實主義採取的是安全極大化(security maximization)策略，並不一定追求絕對權力，當能滿足安全需求時，國家也會接受相對性權力(relative power)(Arora, 2010； Mirza, 2008)。<sup>8</sup>

馬基維利會選擇哪一種路徑呢？在討論混合國(mixed principalities)時，馬基維利探討了威尼斯和法國的失敗歷史。威尼斯為了垂涎倫巴地(Lombardy)兩個城鎮引入法國的力量，但法國勢力進入義大利之後，便滅了威尼斯。法王 Louis XII 後來援助教皇 Pope Alexander 佔據羅馬尼阿(Romagna)，壯大了教皇的力量，又引進西班牙，分割了那不勒斯。馬基維利指法國原可成為義大利的主宰，卻帶來一個足以將自己趕走的伙伴。馬基維利總結威尼斯和法國失敗的歷史得出結論：「誰是促使他人強大的原因，誰就自取滅亡」(P. ch.3)。

馬基維利對威尼斯和法國例子的描述，透露出他的國際政治學採取的是古典現實主義的絕對權力觀，類似觀點充斥於《君王論》中，由此可以推論出他不認為國家之間有真心合作的可能，即使合作，也僅是作為國家擴張權力的工具和過渡，如同威尼斯找法國合作，法國與教廷和西班牙合作，目的都在擴張自己的權力。這個結論使國際社會呈現出一幅灰色的叢林狀態，各國之間互不信任，國家為求自保必須強化武力，而要解除這種「安全困境」，馬基維利提示了兩種途徑，一種是出現壟斷權力的主宰國家；另外一種則是國家之間的合縱連橫以抗衡潛在敵國，這兩種驅動力也使得權力的動態平衡成為國際關係的常態和焦點。

### 肆、權力平衡到權力移轉

在獻給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斯統治者 Lorenzo Medici 的《君王論》中，馬基維利從歷史角度分析了各國如何追求權力平衡，在他著書當時的義大利，包括威尼斯、米蘭、佛羅倫斯、教廷和那不勒斯 5 個邦國，都在爭奪義大利的霸權，為達到這個目的，5 國不斷改變結盟關係，以確保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取得完全權力。最後為了要打破這種權力平衡，這些國家開始引進法國和西班牙等外國勢力，但也使得義大利淪為這些外來力量的戰場，即使 5 國聯

<sup>8</sup> 此涉及國際關係的兩種理論，根據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絕對利得 (absolute gains) 是國家確定自身利益考量的標準，國家衡量的是一個行動的總體效果，包括權力、安全、經濟和文化影響等，認為通過利用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s)，所有從事和平關係和貿易的國家都可以擴大財富，就此而言，絕對利得可說是一種非零和的博弈 (non-zero-sum game)。相對之下，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採取的是相對利得 (relative gains) 思維，國家僅考慮擴大權力，一個國家變得更富有的唯一途徑就是從另一個國家獲取財富，因此是一種零和的博弈 (zero-sum game)。

手也無法抵抗強權軍隊的入侵。

馬基維利並非第一個觀察到國家之間追求權力平衡的人，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斯底德(Thucydides)也觀察到古希臘兩大強權雅典和斯巴達的權力平衡狀態，<sup>9</sup>但他給現實主義最大的啟示不是在分析如何維持平衡，而是這種權力平衡是如何打破的。修斯底德分析雅典與斯巴達的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很正確的觀察到這場戰爭之所以無法避免，緣自斯巴達對雅典崛起權力的恐懼(Thucydides, 1982)。依修斯底德之見，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根本原因緣自權力移轉的恐懼，斯巴達因為害怕失去權力，展開抗衡雅典的行動，包括強化軍力及建立聯盟，雅典也以同樣模式反制斯巴達的威脅。

馬基維利和修斯底德都注意到，當一個國家或集團出現不對稱的力量時，會引起相關國家的恐懼，這些國家會結合起來抗衡崛起的勢力，這正是現實主義觀察到的國際體系現象。現實主義的觀察可以解釋許多歷史事件和國際政治，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評論反法同盟打敗拿破侖後於1814年舉行的維也納會議(the Congress of Vienna)，他認為維也納會議維繫了歐洲的百年和平，成功的關鍵即在於建立了權力平衡的架構，季辛吉結論說：「(這個會議的)目標是穩定而非完善，權力平衡是歷史提供的最明確教訓，若不能對抗侵略，就不會有安全的秩序(Kinger, 1964)。」

然而，權力平衡狀態是自動產生還是被創建，迄今仍是現實主義者爭辯的議題。肯尼思·沃爾茲(Kenneth Waltz)認為權力平衡狀態是自動產生的，他認為國家是一個理性行為者，會憑藉其能力完成目標，國家無可避免會在國際競爭環境產生互動和衝突，結果將使各國達到權力平衡的狀態。沃爾茲表示，權力平衡是國際體系的自然傾向，無論各國同意與否，都會自動形成此一狀態(Waltz, 1979)。在此情況下，權力平衡是一不斷重復的過程，國家的地位與強弱似乎無足輕重，反正體系總是會歸向平衡。

相對於沃爾茲的看法，季辛吉認為權力平衡是政治家的創建。季辛吉強調唯意志論(voluntarism)，認為權力平衡並非自然產生，外交政策的擘劃者並非權力平衡的囚徒，受它所擺佈，反而是權力平衡的創建者以及維持者。政治家們在制定外交政策時可以隨意運用判斷和意志，以達到符合期望的結果(Kauppi & Viotti, 2004)，這種看法賦與了統治者自由空間及形塑國際秩序的主動能力，這正是馬基維利的觀點。

馬基維利思想一個最大的特色，即是強調創建者如何憑藉德行(virtú)克服機運(fortuna)的變化無常。他以形式／質料的對立關係，說明一個成功的創建者，就是能夠以其德行塑造希冀形式的領導者：

當我們研究他們(按指摩西、居魯士、羅慕洛斯、提修斯等偉大創建者)的行動與生平的時候就會知道：除了獲有機會外，他們並沒有依靠什麼幸運，機會給他們提供質料(matter)，讓他們把它塑造成為他們所喜歡的任何形式(form)。如果沒有這

<sup>9</sup> 馬基維利雖然注意到權力平衡的問題，但並未專注到這個現象，在《君王論》中，他僅使用到一次「權力平衡」的概念。他對權力平衡的分析甚至不如修斯底德來得精確，甚至可能受到修斯底德的影響。無論如何，馬基維利和修斯底德都呈現出兩極體系(bi-polar)的權力平衡觀，相對於兩人，真正最早對權力平衡進行詳細分析的是馬基維利同一時代的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他在其所著的《義大利史》(the History of Italy)一書中，首次使用了現代意義的權力平衡一詞，他描述羅倫佐·德·麥迪奇(Piero II di Lorenzo de' Medic)統治的佛羅倫斯：「他(Medici)瞭解到一旦任何強權擴大了它的宰制勢力，將對他本人和佛羅倫斯帶來危險，因此，他小心翼翼的使義大利情勢維持(權力)平衡狀態，不向任何一方一面倒(Guicciardini, 1969:4f)。」

種機會，他們精神上的德行(*la virtu dello animo*)就會浪費掉，但是，如果沒有那樣的德行，有機會也會白白地放過。(P. ch.6)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分析西方政治思想中「權威」(authority)概念時，以馬基維利的創建政治觀做為古典傳統之總結以及現代革命理念的發軔(Arendt, 1983)。她並表示，馬基維利思想中政治創造必然蘊含著暴力的政治觀念，在這一點上，馬基維利悖離了羅馬的傳統，不再將創建視為過去之事件，而是一最高之「目的」，為達到這個目的，不排除使用暴力的手段。鄂蘭於此獨排眾議指出，馬基維利的政治創造其實接近柏拉圖將政治活動視為技術性「製造」(making)的結果(蕭高彥，1998)。

馬基維利強調創建者及不排除以暴力方式塑造「型式」的想法，對於國際政治理論產生很大的衝擊，因為馬基維利堅持擁有完全權力的君主是維持秩序的要件，因此，從馬基維利的角度，至少是從《君王論》的角度，要維持秩序不是尋求權力平衡，而是創建一個具有主宰權力的霸權，此即現實主義關於霸權穩定(hegemony stability)的主要內容。<sup>10</sup> 根據霸權穩定理論，主宰霸權的存在是維持國際關係穩定的關鍵，歷史上有許多例證，例如 19 世紀和 20 世紀初的英國，以及繼英國之後承擔全球霸權角色的美國；反之，若無霸權願意承擔領導角色，就會導致國際失序和不穩定，例如 1930 年代，英國已無力承擔全球領導者，而有能力的美國卻不願意承擔，終於導致全球經濟大蕭條。

霸權穩定理論有一個很大的爭議，按照此論，國際社會將成為一種階層體制，主宰霸權為維護國際秩序，必須享有權力壟斷的優勢，或者至少擁有其他國家無法挑戰的巨大權力。因此，這個論點無法容忍權力平衡，甚至認為主要強權國家不分軒輊的權力，是導致失序的主要原因。如同馬基維利並未認真思考過權力平衡的問題，馬基維利可能也不明白他的創建者觀點，將使他觀察歷史及當時義大利邦國採取的權力平衡受到破壞。主宰霸權的存在既然是確保國際秩序的前提，一旦出現崛起強權(rising power)向現狀強權(status quo power)挑戰，就會動盪既有的國際結構，如同 20 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德國對「不列顛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進行的挑戰。而若崛起強權的權力超越現狀強權，國際社會將發生權力移轉(power transition)，屆時，整個國際權力結構及體系都會陷入重新洗牌的重組漩渦。

權力移轉的發生必然伴隨現狀強權的霸權衰弱(hegemonic decline)現象，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指出：「一旦一個(強權)社會達到擴張臨界點，要維持它的地位以避免頹勢就會產生困難。……體系內衰敗國家和崛起國家之間的力量落差，將在某一時刻產生決定性的權力重分配，並導致體系的不均衡……結果，崛起國家會開始挑戰國際體系的治理規則，勢力範圍和國際領土的分配也會因此產生分裂(Gilpin, 1981)。」除非衰敗國家能夠振衰起敝，否則，吉爾平所謂的「不均衡」極有可能必須透過霸權戰爭(hegemonic war)解決，而過去的歷史也顯示，每一個階段的權力移轉均是透過戰爭完成。<sup>11</sup>

<sup>10</sup> 霸權穩定論也可從霍布斯理論獲得驗證，霍布斯關於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的論點也可適用於國際關係。按照此論，國際體系是一無政府狀態的叢林社會，各國之間彼此猜忌互不信任，每個國家各憑本事維持國家生存，戰爭是它們達到目的的手段及工具。要結束這種彼此戰爭的狀態，必須有一個權力超乎各國之上的主權者(sov<sup>er</sup>ign，或者稱之為霸權)，這個霍布斯所說的巨靈(Leviathan)，即是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和保護人。

<sup>11</sup> 對於權力分布與戰爭的關聯，奧根斯基(A. F. K. Organski)提出另一套看法。奧根斯基 1958 年出版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一書，首度提出「權力轉移理論」的概念，復於 1980 年與庫格勒(Jacek Kugler)合著《戰爭總帳》(The War Ledger)，該書運用量化研究，將古典權力轉移理論觀點與歷史上主要戰爭發生原因，用統計模

從霸權穩定到霸權戰爭的推論對當下國際現勢具有深刻意義。美國「情報委員會」(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2012 年公布一份名為《2030 年全球趨勢：不一樣的世界》(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報告，如圖 2 所示，若根據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人口數量、軍事預算及科技等四項傳統全球權力指標(traditional global power index)計算，中國權力約在 2030 年即趕上美國；若再加上健康、教育和治理等因素在內的新多重因素全球權力指標(new multi-component global power index)計算，中國權力約在 2040 年趕上美國，這將使西方國家自 1750 年以來享有的霸權優勢產生本質上的變化(Fisher, 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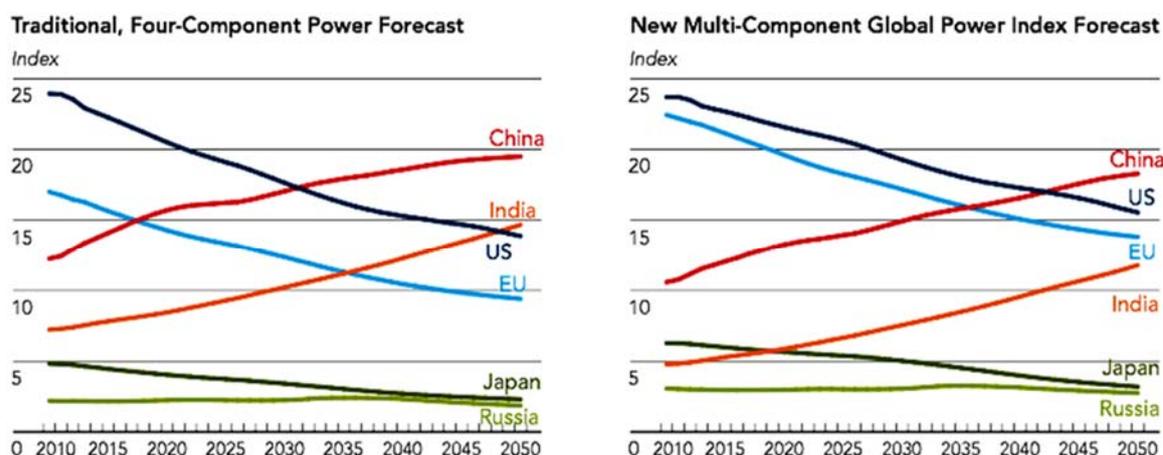


圖 2 2010-2050 年全球權力變化預測

資料來源：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cited from “The coming realignment of world powers, foretold in charts,” *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1, 2012.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worldviews/wp/2012/12/11/the-coming-rise-and-decline-of-world-powers-foretold-in-charts/>>.

雖然中國強調和平崛起（發展）和永不稱霸，但從馬基維利的角度審視，一方面既不必要，另一方面也不可能「永不稱霸」。就前者而言，若霸權的存在有助於國際和平與穩定，則霸權的存在便對國際秩序有利無弊，但此一結論的前提是中國必須是個良善霸權(benevolent hegemony)；就後者而言，馬基維利強調成功的創建者一定會憑藉德行形塑其想要的形式，應用於國際政治，即是形塑可提升其利益的國際秩序，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可能無法自外於創建者創機造勢的內在驅動力，然而，若如鄂蘭所言，馬基維利的創建手段包括暴力；或如吉爾平所言，權力移轉必須透過霸權戰爭解決權力的不均衡，這就意謂隨中國崛起

型加以驗證，而認定當權力分配不均時，戰爭爆發機率較小；當戰爭爆發時，多是由於強國間彼此權力分配均等，或出現後起者超越先行者的現象。進而推論出：權力平衡不利於國際關係穩定，權力不均衡的層級體系才有助於和平維繫之觀點。此一論點明顯挑戰現實主義之「權力平衡理論」。參閱張立德，(2014)，「21 世紀美「中」權力關係檢視與展望：權力轉移理論觀點」，*戰略與評估*，第五卷第二期，頁 92，台北：國防安全研究院。

起導致的全球權力結構重組，可能是一場規模巨大的衝突。中國近年來一直流傳與美國必要有一戰的說法，若真係如此，便陷入馬基維利主義的歷史輪迴。

## 伍、弱國的選擇

若馬基維利是最早發現國際權力平衡者之一，那他也是少數從當時義大利處境的觀察中質疑權力平衡效果者之一。《君王論》中有許多這樣的描述，在第 3 章，他舉羅馬人侵入希臘的例子說：

事情的經過常常是這樣的，當一個強大的外國入侵一個地區，這個地區所有較弱小的勢力，由於對那個凌駕在他們頭上的強大勢力的嫉妒作祟，就會立即依附這個入侵的外國。因此把這些弱小的勢力籠絡過來並不需要什麼氣力，因為他們全體會立即甘心情願同這個入侵國家聯結為一體。

在第 20 章，馬基維利舉義大利的例子說：

義大利過去保持著一定程度的權力平衡狀態，在那一段時期，這當然做得很對，但是我不相信這可以作為今日的一條箴規，因為我不相信這種分裂會有什麼好處；恰恰相反，當敵人迫近的時候，那些內部分裂的城市就會立即喪失了，因為較強的一派總是投靠外國的軍隊，而其餘的部分也抵擋不住。

權力平衡論通常意謂國家間聯合起來抗衡特定強權或威脅，但馬基維利上述評論，我們看到有違權力平衡的歷史，弱小國家不但不會對抗具侵略性的強權，反而會與這些威脅者站在同一陣線，現實主義者將此現象稱之為搭順風車(Bandwagoning)效應。

馬基維利觀察到的搭順風車效應，在他那個時代極具諷刺性。他在《君王論》中以此提醒他心目中的理想君王麥迪奇如何收服弱小國家，進而使較強大的國家屈服，從而成為地區的完全主宰，但義大利並沒有實踐這個策略，反而成為入侵強權應用此一策略的場域。法王路易十二被威尼斯引入義大利並佔領倫巴第(Lombardia)後，包括佛羅倫斯等邦國立即向其靠攏，「全部逢迎他，要成為他的朋友，到了這個時候，威尼斯人才察覺自己所採取的辦法是多麼鹵莽(P.ch.3)。」

因此，同樣的馬基維利，卻有著不同的外交策略，他有時肯定採取權力平衡策略，有時卻認為應採取搭順風車的策略。看似矛盾的立場其實並不矛盾，關鍵在於時機，如同他認為義大利過去採取權力平衡是對的，但在他那個時代，這個策略便不適宜。弱國究應採取何種策略，後文將進一步申論，在此須強調的是，相對於馬基維利對於權力平衡與搭順風車不同角度的論述，馬基維利否定弱國採取中立的立場則非常一致。

在《君王論》21 章，馬基維利陳述安泰奧卡斯(Antiochus)派遣使者到羅馬人的朋友阿凱亞人(Achaens)那裡，勸說他們在希臘與羅馬的爭戰中保持中立，馬基維利針對此事表示：

優柔寡斷的君主，為了避免當前危難，常常採取中立的態度，而且常常因此被人滅了。但是，當君主明確表態支持一方時，如果聯合的一方獲勝，雖然勝利者是強而有力的，你要聽它支配，但是它對你仍然負有一種義務，……即使你支持的一方失敗了，你仍然會受到它的紀念，在他有能力的時候，它會幫助你，你變成可能東山再起的命運的伴侶。

弱國不應在強權之間選擇中立，早在修昔底德《伯羅奔尼薩戰爭》中的「米諾斯對話」(the Melian Dialogue)便有充分的證明。米洛斯在斯巴達和雅典兩強的戰爭中欲保持中立，但雅典使者告訴米洛斯人這是不可能的，米洛斯欲訴諸正義，但雅典使者卻告訴對方訴諸美麗的辭藻無益，最重要的是現實目標，「因為我們都知道，正義是以雙方實力相當為基礎的，強者可以做他們有力量做的一切，而弱者只能接受他們必須承受的一切(Thucydides, 1982)。」米洛斯訴求獨立自主的正義，最後無法抵禦現實主義的「強權即正義」，所有成年男子都被殺害，女人和兒童被賣作奴隸，整座島成了雅典人的殖民地。米洛斯血淋淋的例子，呼應了馬基維利弱國採取中立，最後結果即是滅亡的結論，此一斷言對所有處在強權競逐中的弱勢一方具有深意。

小國和弱國是否應在國際上採取中立，迄今仍是國際政治的爭論，但採取中立主義確實是若干國家的抉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許多國家宣佈中立，但大多遭到佔領，可見中立主義無法保障國家的安全。至二戰末期，包括瑞典、瑞士、愛爾蘭、列支敦斯登、西班牙、葡萄牙、和土耳其都宣布維持中立，但此一中立實有爭議，例如瑞典、瑞士、西班牙就和納粹德國保持聯繫，瑞典更向德國出口鐵礦，對德國的軍備製造相當重要；西班牙曾向德國提供情報，甚至一度考慮加入軸心國；土耳其則在 1945 年 2 月放棄中立，對納粹德國和日本宣戰。

無論如何，中立主義仍舊是部分小國持續的政策，包括摩爾多瓦、蒙古、盧安達等目前仍維持中立政策，甚至國際條約也訂定「中立國」的專門規範，在《海牙第五公約中立國和人民在陸戰中的權利和義務公約》(*Hague Convention (V)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Neutral Powers and Persons in Case of War on Land*)和《第十三公約關於中立國在海戰中的權利和義務公約》(*Convention (XIII) concerning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Neutral Powers in Naval War*)中，都對中立國的權利和義務作出了規定，可見中立主義仍舊是部分國家認為維護自身利益的最佳戰略選擇，國際法也保障了這些國家選擇中立的權利。

無可諱言，中立主義對於部分小國以及研究小國如何在大國主導的國際格局中自處的學者具有吸引力。美國波特蘭州立大學教授布魯斯·季禮(Bruce Gilley)在 2010 年 1 月號《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季刊發表題為「並不危險的海峽：芬蘭化的臺灣有益美國安全」(*Not So Dire Strait: How the Finlandization of Taiwan Benefits U.S. Security*)的文章中，呼籲臺灣應採行中立的政策，他將此稱之為「積極有原則性的中立」(active and principled neutrality)，他認為如此一方面可使中國不再擔心臺灣成為它實現區域雄心的障礙，也不會危及它的對內統治；另一方面可避免中國對臺用兵，擴大臺灣參與國際空間；對美國而言，臺灣中立可除去它與中國發展關係的絆腳石，故臺灣採行中立政策符合美中臺三方利益(Gilley, 2010)。但如果馬基維利是對的，對夾在美中兩大強權之間的臺灣而言，弱國不應採取中立政策的警告，

應讓臺灣對季禮的提議保持戒心。

然而，雖然弱國不應採取中立政策，但究應採取權力平衡或搭順風車政策，馬基維利並未說的很清楚，他對於處於兩強之間的弱國只有設想兩種情況，一種是當其中一國戰勝會讓弱國感到害怕時，此時馬基維利強調決不能採取中立政策；另一種情況是無論哪一方獲勝弱國都不用害怕時，此時弱國必須很審慎的考量支持對象，馬基維利在此提出一個原則，絕不要為了進攻別國而與較自己強大的國家結盟，因為這種情況下，即使弱國獲勝也會成為強國的俘虜。但馬基維利對於這一點並不確定，因為弱國有可能被迫必須與強國結盟，面對這種情況，馬基維利也只能提醒君主小心謹慎(P. ch.21)。

馬基維利的不足，當代現實主義進行了彌補，這主要來自權力平衡與搭順風車兩種策略的差異。前者主要是在面對強權威脅時，弱國為了維護自身安全和增進國家利益，而與其他國家聯合以抵消強權的潛在威脅。權力平衡的目的在改變有利於潛在威脅強權的權力分配現狀，因此會改變現在和未來國際體系的權力分配。相對的，搭順風車策略的目的在取得強權的保護，即使此一強權具威脅性，弱國非但不尋求抗衡具有潛在威脅性的強權，反而順從強權的意志，如同拉丁美洲國家在門羅主義(the Monroe Doctrine)下接受美國的意志。簡言之，弱國願意喪失一定程度的自主權，以換得強權的保護(Ja Ian, 2003)。

兩者目的的差距讓現實主義者歸納出弱國選擇權力平衡或者搭順風車策略的可能情況。首先，當弱國認為加入防禦的一方不會產生任何實質性影響，反而可能招致潛在威脅國家的憤怒時，它就會選擇搭順風車的策略，反之則可能選擇權力平衡策略。在這種情況，地緣位置可能具有關鍵性影響，因為處在強權旁的弱國必須關注這個強權的態度，因此採取搭順風車策略的可能性也會增加；其次，若弱國覺得孤立無援，無法獲得盟友支持時，就可能採取搭順風車的策略，反之，若它自信會獲得盟友支持，便可能採取權力平衡策略；最後，在和平時期及戰爭發生初期，為了抵禦外侮，弱國會採取權力平衡的策略，但在勝負結果已經分曉後，弱國極有可能背叛即將戰敗陣營，向勝利陣營靠攏，如二次世界大戰時的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初期和納粹德國結盟，但後期背棄德國的例子即是(Walt, 2003)。

若能確實瞭解弱國的選擇，將能給與強權外交操作的空間，然而，答案並不如想像簡單。所有的強權都希望弱國與其同一陣線，以擴大其國際勢力範圍，但若因此欲以強制方式強迫弱國搭順風車，結果可能適得其反。二次世界大戰的納粹德國和帝國主義日本，都曾因此吃到苦果。冷戰時期的蘇聯曾恫嚇挪威和土耳其不要加入北約組織(NATO)，結果卻刺激兩國強化與西方國家的聯盟關係；同樣的，1960 至 1970 年代，蘇聯曾相信大幅強化軍備會強化它的反西方力量，結果卻造成中國與美國的和解，共同聯手對付它。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史蒂芬·華特(Stephen M. Walt)指出，歐洲 30 年戰爭後(the Thirty Years War)的發展歷史顯示，所有企求成為霸權的國家，都遭遇到反抗聯盟的抵制。他結論說，國家對權力平衡的偏好超過搭順風車，原因很簡單，因為每一固國家都無法完全確定其他國家的行動，如此一來，搭順風車的國家將面臨極大風險，一旦依附的國家改變意圖，它們將身處險境。因此比較而言，採取權力平衡的策略對國家最為有利(Walt, 2003)。易言之，通常情況下，國家會偏向選擇權力平衡，這也意謂，欲追逐霸權夢想的國家，將會遭遇其他國家聯合抵制。

## 陸、結論

馬基維利被視為是當代政治現實主義的奠基者之一，他的思想也對當代國際政治產生深遠影響，他從政治現實出發，擺脫傳統道德與應然束縛，探討國際政治的實際運作與對應作法。他的現實主義思維影響利弊難料，卻深刻勾劃出實際存在的國際關係，也因為如此，讓以生存及利益為導向的現代國家，不得不正視現實國際環境，並從馬基維利思想中尋求智慧。

馬基維利對國際政治的觀察從國家性格的描述出發，他將國家擬人化，認定國家如同個人具有趨利避害、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國家理性，身處這樣的世界，權力和安全是統治者最高考量，這個思維是政治現實主義的核心。現實主義亦帶有非道德的色彩，當國家覺得有利於它的生存與安全時，會遵循普世道德原則，但若傳統道德無益甚至有害國家安全和利益時，統治者必須毅然決然拋棄道德，採取非道德行動。近代國家採取非道德行動的例子不勝枚舉，美國許多外交與軍事行動，都是循著類似的邏輯。

國家既以國家安全為優先考量，必定重視軍事建設，加以馬基維利強調國家具有擴張傾向，這種傾向會進一步刺激各國強化武裝。當所有國家都大幅挹注軍事投資時，將形成軍備競賽的「安全困境」，國家在強化國防的同時卻不會感覺到安全。這個結果對中國和亞太安全很重要，因為隨著「中國威脅」論的崛起，亞太已隱約出現各國競相挹注國防的軍備競賽，要解決這個問題，應從國際合作和建立互信著手，但現實主義對此有不同的理解，新現實主義認為有此可能，古典現實主義則持否定的看法，而馬基維利思想則偏向後者。

馬基維利探討過去歷史和義大利當時所處國際環境，發現各國為維護自身安全和擴大利益，會採取權力平衡的策略。雖然馬基維利並非第一個觀察到這種現象的人，但他是最早強調「創建者」可憑藉德行塑造國際秩序者之一。但此一論點勢必打破權力平衡的有效性，將國際秩序推向霸權穩定論，國際社會將始終存在崛起霸權向現狀霸權挑戰的現象，當前者權力超越後者，就會產生權力移轉，而迄今歷史上的權力移轉皆透過戰爭完成。這種局面對當代國際政治有很重要的影響，因為中國國力正快速趕上現狀強權美國，若權力移轉必定透過戰爭，則過去霸權戰爭的歷史將在未來的某一時點重現。

對於弱國而言，必須在強權之間審慎決定符合國家最大利益的政策。馬基維利觀察到弱國不見得採取權力平衡的策略，反而有時會與威脅自身的強權站在同一陣線，這是現實主義所謂的搭順風車效應。弱國或許會選擇採取不偏向任何強權的中立政策，但馬基維利強烈指出，採取此一策略將自取滅亡，這使得弱國必須在權力平衡和搭順風車策略之間做出選擇。雖然所有強權都希望弱國搭它們的順風車，但由於弱國搭順風車等於是將自身生存交在強權手中，故多偏向採取權力平衡的策略。這也提醒所有爭奪霸權的強權，若欲採取強制方式迫使弱國就範，結果可能適得其反，將弱國推向敵對陣營。

## 柒、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 王義桅、唐小松、張登及（譯）（2021）。**大國政治的悲劇**（原作者：John Mearsheimer）。臺北市：麥田出版。
- 張立德（2014）。「21世紀美「中」權力關係檢視與展望：權力轉移理論觀點」。 **戰略與評估**，5(2)。臺北市：國防安全研究院。
- 張旺山（1997）。「馬基維里革命：『國家理性』觀念初探之一」。載於陳秀容、江宜樺（主編），**政治社群**。臺北市：中央研究院。
- 閻亢宗（2007）。**外來政權現象：柏拉圖與馬基維里的哲學思考**。臺北市：秀威公司。
- 蕭高彥（1998）。「馬基維利論政治秩序——一個形上學的考察」。 **政治科學論叢**，9。臺北市：臺灣大學。

### 英文部分

- Agence France-Presse. (2012). *China leads a surge in Asian military spending, US report says*. Retrieved from <http://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1062705/china-leads-surge-asian-military-spending-us-report-says>.
- Arendt, H. (1983).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Harmondsworth: Penguin.
- Arora, N. D. (2010). *Political Science for Civil Services Main Examination*. New Delhi: the Tata McGraw Hill Education Private Limited.
- Fisher, M. (2012). The coming realignment of world powers. foretold in charts. *the Washington Post*. Retrieved from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worldviews/wp/2012/12/11/the-coming-rise-and-decline-of-world-powers-foretold-in-charts/>.
- Friedman, A. (1993). *Spider's Web: The secret history of how the White House illegally armed Iraq*. New York: Bantam.
- Gilley, B. (2010). Not So Dire Strait: How the Finlandization of Taiwan Benefits U.S.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89(1).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 Gilpin, R. (1981).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 Guicciardini. (1969). *The History of Italy*. London: Macmillan.
- Hobbes, T. (1974). *Leviathan*. In M. Oakeshott (Ed.). New York & London: Collier Macmillan.
- Ja Ian, C. (2003). Revisiting Responses To Power Preponderance: Going Beyond The Balancing-Bandwagoning Dichotomy. *RSIS Working Papers*, 54. Singapore: Logo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 Jervis, R. (1978). Cooperation Under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30(2).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Kauppi, M. V., & Viotti, P. (2004). Realism, The State, Power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ew York: Prentice Hall.
- Keating, J. E. (2011). America's Other Most Embarrassing Allies. *Foreign Affairs*. Retrieved from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01/31/americas\\_other\\_most\\_embarrassing\\_allies](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01/31/americas_other_most_embarrassing_allies).

- Kinger, H. A. (1964). *A World Restored: The Politics of Conservatism in a Revolutionary Age*.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 Krokowska, K. (2010). *Cooperation Among Adversaries: Regionalism in the Middle East*. 10 Avenue des Fleurs: Centre International de Formation Europeenne.
- Machiavelli, N. (2012). The Prince. In W. K. Marriott (Ed.),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Retrieved from <http://www.gutenberg.org/files/1232/1232-h/1232-h.htm>.
- Mirza, N. M. (2008). Water, War, and Peace: Linkages and Scenarios in India-Pakistan Relations. Working Paper, 37. *Hiedelberg Papers in South Asian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Heidelberg: University of Hiedelberg.
- Morgenthau, H. J. (1974). *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Nikkei Asia. (2022). Asia's military spending up 2.8% in 2021, bucking 1.8% global drop, 22. *Nikkei Asia*. Retrieved from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Asia-s-military-spending-up-2.8-in-2021-bucking-1.8-global-drop>.
- Ofuho, C. H. (2004). Security Concerns in the Horn of Africa. In M. Mwagiru (Ed.), *African Regional Security in the Age of Globalisation*. Nairobi: English Press Limited.
- Pocock, J. G. A. (1975).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hucydides. (1982).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n R. Warner (Ed.). Harmondsworth & New York: Penguin Books.
- Walt, S. M. (2003). Alliances: Balancing & Bandwagoning. In R. J. Art & R. Jervis (Ed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nduring Concepts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New York: Longman.
- Waltz, K.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 Weber, M. (1978). Politics As a Vocation. In H. H. Gerth & C. W.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